

“交异”与“融通”:近代以来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变迁

王凜然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天津 300350)

【摘要】19世纪,社会学具有强烈的历史取向,历史学对社会学则兴趣匮乏。20世纪前半叶,历史学开始向社会学寻求合作,主流社会学却走向具象经验化研究。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社会学界倡导“历史转向”,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得以再兴。同一时期,社会学取向的历史研究虽偶有波折,依旧方兴未艾。通过对学科关系史与相关理论的对读,我们发现:两门学科关系发展受制于学科组织关系;两门学科关系因各自学科研究目的、对象、方法而变化;两门学科关系受外部环境影响;两门学科关系被学科发展时序差所左右。四重逻辑并置导致了西方社会学与历史学百余年来交异的融通。

【关键词】社会学;历史学;学科发展史;学科组织关系;学科时序差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9)03-0039-12

DOI:10.14084/j.cnki.cn62-1185/c.2019.03.006

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在数十年前的名著《新史学》中曾乐观畅想历史学的前途,他说未来的历史学“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1]40}。今天看来,勒氏的预测确实过于乐观了。事实上,在学科发展史上,很少有两门学科的关系像社会学与历史学那样复杂,且“令人困惑”。英国社会学家帕特里克·贝尔特说,“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像一个有问题的婚姻,先离婚,然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又复婚了,从来没有形成共处和相互尊重的关系”^{[2]136}。贝氏的描述虽有所夸大,但因“对于重建人文科学来说,最困难之处总是涉及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极端重要的关系”^{[3]“前言”8},故而两门学科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何以会如此却着实是一个迷人且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检索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还较少,虽大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也留下了极大的补充空间。首先,已有成果多探讨两门学科间的结合,较少关注二者之间的紧张^①;其次,已有成果多立足于各自学科本位,较少关注两门学科在互动中的演进^②;最后,已有成果多从学科内

① 如郭方《近百年来西方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发展历程》,《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夏学花、薛雅丽《历史社会学和社会历史学的比较研究——历史学与社会学交叉关系初探》,《中州学刊》2002年第2期;李凡《社会学的历史学转向及历史社会学的兴起》,《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8年第3期;陈纪昌《社会学的历史化还是历史学的社会化——论历史社会学的学科定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等。

② 如以社会学为学科本位进行考察的有:卢晖临《社会学的历史转向》,《开放时代》2004年第1期;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2015年第1期;肖瑛《非历史无创新——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等。以历史学为学科本位进行考察的有:赵世瑜《社会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江海学刊》2014年第6期等。

【收稿日期】2019-02-07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新中国初期天津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1949—1957)”(项目编号:TJZLQN17-001);南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天津城市社会变迁研究(1949—1986)”(项目编号:63192708)

【作者简介】王凜然,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学、社会学研究。

智识进展的角度展开,缺少学科内外复杂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因素的综合考量^①。我们须认识到,史学史(也包括社会学史)并不仅是一个学科自身的流变史,还是一个由有知识的群体组成的社会的历史。一定程度上说,每一个学科都“是一个行业,甚至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行会,在这个群体内部,有那么多与手工艺、作坊和工作台相似的东西”^{[4]25}。缘于此,我们拟从组织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角度对近代以来^②西方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以及影响两门学科关系发展的有关因素进行一次整全式的梳理,这一梳理或可为更加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学、历史学学科(并交叉研究)发展提供批判基础上的借鉴。

—

在社会学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学家们大多拥有“历史敏感性”,并致力于从历史中发掘社会变迁的特征与规律。社会学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认为,将“人类不同的连贯的状态作历史的比较”^{[5]23}是“最适应社会现象本性的方法,是社会学的专门方法”^{[5]23}。在其代表作《论实证精神》中,孔德“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将人类史划分为三个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6]2}。卡尔·马克思关于资本、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关于“军事社会”与“工业社会”二分的论断,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关于从“公社”向“社会”进化的观点,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关于“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思想,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关于传统型、法理型与卡里斯玛型等社会支配类型的划分,莫不是建立在作者带有强烈历史感的理论分析之上^③。涂尔干说:“社会生活中的目前事件并非来自社会的目前状况,而是来自以往的事件,来自以前的历史事件。社会学的解释完全在于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7]128}对于学科初创时期的社会学家而言,“寂然凝虑”固然可得理论创造,但“思接千载”更是创造理论的经验来源。

早期社会学著作中的“历史取向”其来有自。经济上的英国工业革命与政治上的法国大革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极其剧烈的变迁造成的“分离感”引起了人们“深刻的不安”。知识界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8]13}来解释变迁中的社会。加之,由于这一变迁是从历史深处走来,“理解社会”仅靠共时性静态分析是远为不够的。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的历史积淀已经为早期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取向”提供了“自然的问题域”与“实验室”。“正是基于变迁,基于变迁造成的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的过度分离,才使人类有可能第一次科学而理性地将社会作为自然的历史过程进行观察和思考。”^{[9]22}此外,社会学诞生前、文艺复兴后的西方著述也大都具有历史阐释的传统,“在他们著作的表面之下深深含有一种历史过程的概念”^{[10]82}。如意大利思想家乔巴蒂斯塔·维科的著作《新科学》详细描绘了“世界各民族所经历的历史过程”;法国思想家查理·路易·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本身就是重要的政治理论史著作;英国思想家亚当·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对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至今仍深具启发。蹈常袭故,学科分工尚未精细,社会学破壳将出,已有的知识方法论遗产自然易被学科刚起步时期的社会学家们所承继。由是之故,进入19世纪,生活在欧洲大陆的社会学初创者们表现出了对“历史”的高度重视。

^① “一个学科的整体发展决不仅仅意味着学科的理智进展”因为,仅从“理智进展”角度,“无法使我们完整地把握学科中理智力量逐渐积累的动态过程以及它在科学共同体中学术地位和合法性的升迁过程”。见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进而,有学者指出“一个学科之所以成为一个学科,就在于它自己独特的范式(paradigm)。范式有观念层面的,也有社会建制和社会运作层面的。”见吴国盛《学科制度的内在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我们认为,在探讨社会学与历史学关系史的问题上,除了需要理智进展的梳理外,还需要知识社会学、组织社会学等方法的介入,考量其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

^② 1824年,德国历史学家兰克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出版,标志着“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拉开了序幕”,见易兰《西方史学通史》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2页;1825年,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开始撰写《实证哲学教程》,“在这部著作中他明确地创立了社会学这门学科”,见特纳、毕福勒、鲍尔斯《社会学理论的兴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本文所称“近代以来”即以1825年左右为时间起点。

^③ 有学者认为,孔德、斯宾塞、滕尼斯、涂尔干早期的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与马克思、韦伯的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在方法上仍有较大区别。前者可称之为“历史哲学的反历史主义”,后者更接近“正统的历史主义”。见彼得·什托姆普卡《社会变迁的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5页。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学家所需要的“历史”以及通过“历史”所呈现的图景与历史学具有不同的指涉。社会学研究似乎更为强调一种“总体性解释”。因而,草创时期的社会学家们并不满意同时代的历史学研究。孔德辛辣地写道,历史学著作将“历史降低到一大堆互不连贯的描述,此外什么都没有的地步,在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描述中各种事件真正的来源全都不见了”^{[11]290}。质言之,在社会学家看来,“作为我们智慧成熟标志的根本革命,主要是在于处处以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本义的起因”^{[6]11}。滕尼斯认为“只有作为事实的堆集的历史自身,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哲学。然而,一旦在它当中可以发现人类的生存规律,它就二者皆是。”^{[12]12}社会学家如此看重导因于自然科学的“规律”与“普遍性”,这与飘扬在近代欧洲思想界上空,经康德奠基^①、费希特、谢林阐发,黑格尔再陈述的“大写的理性”不无关系^②;更与这一时代自然科学所取得的巨大“威望”不无关系^③。期待与物理学、生物学革命一样,“可以归纳得出抽象法则的公式,超越时空的真理”^{[13]226},渐成为近代社会科学的一种准意识形态。如是之故,社会学就与渐更强调“个体”“非规律性”“窄小问题”“专门研究”的西方近代史学在研究鹄的上种下了交异的种子。

“历史(是)法国大革命之女。”^{[14]6}与社会学的兴起类似,新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史学变革亦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史学与客观主义史学交相辉映,非期然性地加速了近代历史学的组织化进程。就浪漫主义史学而言,‘事实上,它像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一样渗进了当时的一切作品或几乎一切作品中’^{[15]211-212}。不同于社会学,由于对“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的怀疑,对社会变革中秩序失范等现象的否思,浪漫主义史学更为强调个体、情感、本民族与前近代文明的优点,进而“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个体的和独特的性质,而不存在普遍性和规律性”^{[16]132}。就客观主义史学而言,作为其中最重要代表,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提出了历史学“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17]9}的重要观点。兰克认为,只有“为特殊性本身”^{[18]209}而热爱,抵制“先入为见”的权威,才能够获得历史学家的位置。因认为“每一个故事都与其他任何的故事有着经验上的差异”^{[19]11},历史学家对“新兴的‘社会科学’的倡导者所做的概括工作(即建立社会普遍法则的工作)持一种怀疑,甚至敌视的态度”^{[19]11}。这种反理论的姿态,既与此时的社会学研究鹄的有所抵牾,也是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观的反动^④。在这两大史学思潮引领下,至19世纪后半叶,历史学家们“放弃了对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史的兴趣,而把政治史、民族史和国家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中心”^{[20]245}。换言之,“西方大学里专业历史的出现与民族利益密切相关,而且这一专业的权威源于其民族真正的发言人这一身份”^{[21]21}。陈陈相因,历史学由此赢得了各国政府的支持、更高的学科声誉和较为完整的学科地位^{[22]2},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即隔断了它与其他学科的联系”^{[23]495}。马克思对此曾具有先见性地给予了批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24]173}。

20世纪前半叶,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出现了变化。社会学逐渐丧失了历史感,历史学却开始主动加强与社会学的联系。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家卡尔·兰普勒希特在德国尖锐批评专注于国家与精英的历史研究,爱德华·艾格斯顿、詹姆斯·哈特·鲁滨孙在美国大力倡导“扩大历史研究范围

① 康德认为“人类的行为,却正如任何别的自然事件一样,总是为普遍的自然律所决定的。历史学是从事于叙述这些表现的;不管它们的原因可能是多么地隐蔽,但历史学却能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行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页。

② 所谓“大写的理性”隐含着一些假定:一是客观化假定,即对于理性的客观效果的想象。科学技术对自然认识、改造和控制的功能,激发了对人类理性的崇尚之风。人们坚信终有一天可以穷尽这个世界的客观法则,建构出完备的因果关系链条,这一理性模型将为人规划的社会工程提供充分保证。二是主观化假定,即对于理性的主观能力的想象。这个时期(以及后来很长时期)的人们相信,“真知追求的永远都是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见杨敏、郑杭生《依然在路上:穿越历史大弯道的个人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③ 自然科学的威望既来自于科学对人类智识的贡献,也来自于其他物质性因素的作用。“科学成为胜利者,不单是因为他们定义了自己为科学而其他学科不是科学,因而摄取了西方文化赋予诠释自然之土和生产真理者的认知权威,更加因为他们成功掌管了学术机关和资源。”见[美]华勒斯坦等《科学·知识·权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4页。

④ 更接近启蒙运动的遗产,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倾向于把独特事件化入一个理念的连续性之中,化入一个目的论运动或一个自然的链条中”。见[法]福柯《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刘北成、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无论浪漫主义与客观主义史学之间有多少分歧,它们在对“理性主义史学”的批判中却都具有高度的共识。

和方法” 弗朗索瓦·西米昂在法国呼吁历史学“向社会学实验开放时间维度”^{[38]344}。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新史学”倡议均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兰克史学,进而提出了具有革新性质的学术诉求:历史研究需要扩大视野,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①。1917年后,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史学思想影响越来越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政治史的地位也造成了冲击^{[25]10}。1929年1月,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共同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年鉴》发刊词倡导“围绕历史学建立社会科学共性”。费弗尔之所以选用“社会”作为刊物名称,不仅因为法国社会学界重要的涂尔干学派对其的影响^②,更有费弗尔用社会科学改造传统史学的雄心。因对历史学不顾社会科学研究,只管“筑起高墙,精心培育各自的葡萄园”^{[26]282}不满,布洛赫多次强调,“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差别”^{[25]51},历史学应向社会科学开放^{[4]32}。春江水暖,年鉴学派不仅倡议,还身体力行,率先“成为指导西方历史学家进入陌生的渠道并且提出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的主要推动力”^{[25]42}。

社会学方面,随着研究中心的位移,美国渐成为“20世纪社会学理论发展的中心”^{[27]53}。在强调实用主义的美国学术界看来,欧洲社会学显得过于空泛^{[28]162}。他们认为,欧洲社会学思想中“关于发展的模式中有许多观点是值得怀疑的”^{[29]序言11},如“社会必然会朝着进步和越来越完善的方向变化发展”等^{[29]序言11}。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学抛弃了欧洲社会学传统中的“宏大理论”,快速“转向现代的系统性研究”^{[30]12}。1894年出版的美国社会学教科书《社会研究入门》明确提出“社会学”是具体地“研究和解决‘贫困、犯罪以及如何对付那些有依赖性、有缺陷和有过的阶级的的问题’”^{[31]111-112}。简而言之,“诞生于现代秩序的社会学的使命就是改良社会”^{[27]57}。在社会学被改造为具象经验学科的过程中,芝加哥大学的城市社会学派功不可没。曾做过记者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罗布特·帕克将自己的现实感带入社会学研究,强调“走进田野通过个人观察收集资料的必要性”^{[32]47-48}。芝加哥学派的“实质兴趣便来源于此”^{[32]47-48}。该学派“主要作用在于,使实地调查成为一项完全合法的科研事业和社会学的真正基础”^{[28]171}。通过培养学生、组织团队、出版教科书、在学术界大力倡导田野调查,芝加哥学派获得了极大影响。“1921年后的美国社会学,在方向和内容上主要是由帕克和伯吉斯的这本教科书确定的。”^{[33]26}紧随其后,20世纪3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崛起。因推崇“数量化研究”和“科学性”,哥大社会学在知识累积上为社会学的具象经验化研究再添新薪。经验化社会学研究还越过大学围墙,向社会提供直接服务。大萧条时期,美国职业促进管理会、农业部、自然资源委员会都雇佣了社会学家做工作。二战期间,美国国家作战部、价格管理办公室、商务部又招募了大批社会学家做咨询^{[34]19}。利用具有政府背景的平台,“这些学者从广泛的社会状况去研究士兵的态度与士气:装备使用情况、官兵关系、黑人—白人关系、点名的退伍制度(the point system for discharge)以及战时表现”^{[35]289},推动学科发展。由此,“现实的生产生活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36]545},以美国社会学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学研究完全转向现实、静态和具象经验化。

二

二战后,美国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界的霸权地位得以巩固^③。哈佛大学社会学及其社会学家塔尔

① “新史学”概念是美国历史学家 E. W. 道于 1898 年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的《新史学的特征:评兰布雷希特的〈德国史〉》一文中所提出。文章认为,“历史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家和个人的政治行为或动机,而要研究人类生活经历的各个方面。所有这些方面构成了一个整体,并且受到普遍法则的制约,因此可以应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加以研究”。见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9-350页。

② 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学对早期年鉴学派产生了较大影响。如,年鉴学派主流的社会史范式来源于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家弗兰索瓦·西米昂;对费弗尔和布洛赫产生影响的概念都来自于涂尔干和莫斯;涂尔干本人更是布洛赫在巴黎高师就读时期的老师,且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参见[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序第12、17页、正文第9、13、19页。年鉴学派的后继者并不讳言这一影响,“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白兰士(Vidal de la Blache)、弗朗索瓦·西米昂(Francois Simiand)和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是这种新史学的教父”。见[法]勒高夫《政治史还是历史学的骨干吗?》,刘北成、陈新编《史学理论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8页。

③ 以法国为例,“对于二战以后的那一代法国社会学家来说,到社会学的圣地美国去朝圣已经开始成为一种惯例。有些人由于输入美国的思想成果而在法国一举成名”。见[美]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主导着此一时期的社会学界^[37]。虽然对先前的经验社会学有所批判,但帕森斯同样对历史取向的社会学研究毫无兴致。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强调“社会的内在功能,而不指用历史术语分析的过程”^{[38]350},更“放弃了历史学以采纳一个在本质上是静态的观点”^{[38]350}。帕森斯十分尊崇韦伯,但他只是将其“对于历史的关注,固化为后续研究的指导理论而非主题”^{[39]690}。简言之,“历史”完全成了社会学的研究背景,而非对象。更加组织化的学科制度、学科文化规训也使得社会学家们对韦伯时代的宏大关照缺乏兴趣。“知识的专门化就这样使教授的眼光日趋狭窄;他的成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40]101}。社会学家们满足于中产阶级的圈层隔离状态,“使得人们的心智局限于探究的微小领域,而不能包容作为整体的人和社会”^{[40]101}。毫无“历史感”的主流社会学家认为,“因为社会学分析所获得的对当前的真正理解,使人们能够推知和解释过去”^{[41]8}。须注意,此一学科自负与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快速提升有关。在西方主要国家,由于二战期间的杰出表现,凸显“科学性”与“实用性”的社会学收获了广泛的赞誉。社会学在高校、政府、企业等部门的需求大量增加;新的社会学教授席位、学科点、调查机构陆续设立;受过教育的大众对社会学充满兴趣,社会学“确立了它自己的公众威信”^{[39]303}。“人们期待着社会学家具有一种能被企业负责人、行政部门主管官员以及计划工作者所用的具体实用的知识。”^{[14]25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政府与国际组织领衔的大规模社会调研项目也进一步增强了社会学的学科知名度。1945年至1965年,由于基本处于自身学科史上的“黄金时期”^{[42]95},社会学大为削弱了其和历史学的联系^{[43]28}。

互为反题的是,承继20世纪上半叶的研究趋势,社会学取向的历史学研究在西方史学界反而形成了强势的潮流^{[44]60}。“动力主要来自社会科学”^{[25]57}和传统史学自身的“危机”^{[45]92-93}。与社会学这种“快速发展、有充裕基金援助以及可信度高的社会科学比较起来”^{[30]26},战后初期的历史学被视作“一门差劲可笑的学科”^{[30]26}。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称“仅是新知识的积累,对集体研究的需要(这种集体研究必需考虑周到的组织)就足以使人文科学不知所措。”^{[46]799}有学者进而提出了更加悲观的判断“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方法论上,历史学都到达了‘僵死的终点’。”^{[25]117}面对社会学咄咄逼人的崛起,处于学科发展下降期的历史学,开始更主动地放下学科畛域,向社会科学寻求奥援。1954年,美国历史编纂学委员会发表报告《历史研究中的社会科学》,成为“跨学科研究方法在美国史学中开始广泛运用的某种宣言”^{[47]21}。乘此东风,1955年,年鉴学派在法国取得了比战前更大的成功与声誉^{[48]202},“为法国树立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相互交流的榜样”^{[25]51-52}。1955年召开的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表了关于历史学与相邻学科关系的报告。报告认为社会科学能够为历史学提供新的史料和方法,从而“标志着战后国外史学中跨学科方法的兴起”^{[47]20}。史学史研究也确认,1955年开启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25]53}的趋势。

20世纪60年代始,黑人解放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等左翼运动横扫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西方学术界被更大程度地激活。战后的科技革命促进了新的技术手段,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历史学家无论是在学校、大学,甚或在家中,由于可以通过电视或电话使用计算机,因此面临着多得不可胜数的辅助手段来计算和分析他的材料”^{[49]196}。多种因素的互促下,历史学广泛运用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模式、方法和概念,诞出了更加丰富多彩的新史学形式^{[50]120}。传统精英政治史的式微反衬着社会史、新社会史、家庭史、妇女史、少数族裔史、城市史、新政治史等新史学流派的大行其道。1974年成立的“社会科学历史协会”(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巩固与扩大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交流^{[22]35}。至1978年,仅以美国社会史领域为例,其发表的论文数量就增长了三倍,“超越政治史而成为研究生最主要的研究领域”^{[51]127}。日本史学界开始关注“社会各阶层——不限于统治阶级——的家庭、家族结构、衣食住以及与生活相关的语言、习俗、祭祀、信仰、礼仪、身体、性、疾病等等这些以往历史学几乎无暇顾及的问题……历史学向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靠近”^{[52]19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历史学界,作为兰克故乡,并以保守主义著称的旧史学堡垒,“战后德国历史主义的破产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新结合开辟了新的途径”^{[25]57},且催生出了“历史社会科学”学派。由于深谙韦伯与马克思的学术思想,该学派提出“历史因而是一门要求定性理解的科学”^{[53]200}。他们借用社会科学的

概念、模式与理论,在新的问题意识下,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期、比较、说明与排列,“其目的是重视历史事实的结构、过程和相互联系”^{[54]139}。无论是法国年鉴学派、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等战后西方三大史学流派,还是在其辐射下的日本、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历史学界,都在积极实践着历史学的“社会学转向”。

随着历史学家对社会学了解不断深入,他们也发现了同时期社会学中存在的问题。“如果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了解到社会学和人类学能够对他们的工作做出贡献,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相信历史学也可以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增添极为重要的新维度,即时间维度,而且一般都承认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于这一维度一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25]79}来自历史学学科的批评反映了战后社会学研究自限学科窄框后出现的“全然静态的社会观”之窘境。英国科学史学家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尖锐地指出“任何人只要读一读最近二十年来出版的(社会学)著作,自己就能证实这种情况。官方的社会学理论都是过分地墨守形式,从其中找不出一点历史发展的迹象。”^{[55]865}类似批评在社会学内部也不乏其人。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讽刺到“经验的、分析的社会学归根到底也只是一种社会志。”^{[56]3}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将炮口对准“现代”社会学,反向提出了“每一种思虑周详的社会研究,都要求其观念具备历史视野,并能充分运用史料”的著名观点^{[57]202}。权威性的《美国社会学评论》也出现了关注历史的声音:“社会科学当前最明显的缺点是缺乏时间元,缺乏深度,这种深度不可能产生于对社会作静止的研究。只有研究社会在连续不断的变化中呈现自己的各种力量的动态格局,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深度。”^{[25]273}而恰在此时,初兴的美国区域研究成为战后西方学术界较早实践历史向度的社会学研究的领域^{[19]39-42}。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针对共同的研究区域,打破“过去”与“现在”的学科分界,社会学与历史学“从一个明确的出发点可能跨越学科界限,通向迄今或许闻所未闻的所在”^{[58]64}。紧随其后,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影响的退潮、左翼运动的勃兴、马克思主义的回潮更大力度地推动了社会学研究的历史转向。社会学界陆续出现了巴林顿·摩尔、查尔斯·蒂利、西达·斯考切波、佩里·安德森、迈克尔·曼、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一批杰出的历史取向的社会学家^{[39]4}。川河汇流,以《英国社会学杂志》刊出的历史维度的社会学论文数量看,1973年至1975年仅9篇,但1976年后增长迅速,短短两年即达24篇;迨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主要社会学期刊刊登的论文约1/4均具有历史取向;美国社会学学会成立了比较历史社会学分会,英国社会学学会举办了主题为“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年会,“历史社会学的黄金时代”^{[59]358}到来了。21世纪初,这股社会学“历史转向”的“潮流”进一步发展,“已经变成十足的湍流”^{[60]208}。今天,历史社会学在社会学界稳固地占据着属于自身的学科地位,“社会理论与历史的融合”^{[61]11}成为当代西方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之一。

20世纪70年代后,结构功能主义的一统局面彻底崩解,社会学呈现出包罗性与分散性并存的发展特征,一些社会学家“将他们的兴趣扩大到对情感、文化的研究以及日常生活规范的创造”^{[22]37-38}。20世纪80年代后,受到“文化社会学、文学理论和社会学领域”的“文化转向”的影响,西方史学又出现了新的变化^{[62]88-89}。随着“微观史”“新文化史”对过度结构化的历史研究的批判与省思,社会学取向的历史研究开始朝向社会与文化并重的道路前行,“社会史由于对语言和表象文化史的重视而大大加强了”^{[63]35}。历史学家们认识到,“文化和社会(以及其他可能的)研究方法的结合,将会产生最为丰硕的成果。我们还将继续坚持来自于不止一种学科的研究方法”^{[64]“序言”2}。进入21世纪,“新文化史”有所式微,新的史学实践(如“新新文化史”“后社会史”等)又在成长。不管研究潮流如何变幻,历史学与社会理论“融合的程度却越来越深了”^{[65]13}。换言之,“不是年鉴学派消亡了,而是人人都成为了年鉴学派”^{[65]13}。今天,更多的历史学家“逐渐自由地跨越了社会、文化、政治、思想等之间传统的界限,使新的混合形式得以产生”^{[66]314}。总体而言,受“社会科学主流范式”^{[67]“代译序”11}变化以及“新文化史”思潮影响,社会学取向的历史研究虽产生了一些波折,但依旧方兴未艾。

三

梳理社会学与历史学两门学科关系发展历程,通过理论与史实的对读,我们发现:两门学科关系发

展受制于学科组织关系;两门学科关系发展因各自学科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变化而变化;两门学科关系发展受外部环境变迁影响;两门学科关系发展被学科发展时序差所左右。四重逻辑并置导致了西方社会学与历史学百余年来交与融通。

(一) 两门学科关系发展受制于学科组织关系

作为一种知识组织,“学科是由一群学者以及学者们依赖于一定学术物质基础、围绕知识进行的创造、传递、融合与应用的活动所组成的组织系统”^[68]。韦伯指出“一旦组织存在,它就有内在的生命力,力图维持其生存与发展。”^{[69]333}无论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它们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有为数不少的成员会誓死保卫他们的领地”^{[42]109},即学科的“利益”。这种利益由学科组织成员共享,以学科组织制度为表征,并内化于学科组织文化。作为两门学科关系发展的内生性变量,学科组织扩大了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的交与,也留下了彼此间融通的窗口。

“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新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19]8-9}以社会科学为例,“这些领域的学者当时陆续创设各自的专业学会和期刊,与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分道扬镳”^{[70]12}。学者“在希望跨越学院的界限以开展合作研究时会感受到较大的制度压力,这些压力有的来自学科内部的考核评估制度,有的来自机构内部的资助惯例”^{[71]191}。因为“被界定为学术越轨者”,包括历史社会学、社会史在内的学科交叉研究,在初期“往往无法在分界森严的权威出版物上发表;他们也较难获得经费资助”^[72]。不过,学科组织制度化在制造邻近学科关系交与外,也存有融通的潜功能。这是由于学科是一种自致性组织,为发展计,“一方面,它需要固定的边界,且需要有序的精英队伍去捍卫这些边界;而另一方面,为了达成它所需要的连续不断的成功(尤其是在科学领域),它需要保持对各种异见的开放姿态”^{[73]157-158}。因此,学科组织制度就会在一定时期(具体见“学科发展时序差”)鼓励本学科侵入邻近学科,扩大学科领地,以增进学科利益。如,年鉴学派为成为“总体科学”而在制度上不断试图将社会学纳入门下的努力就是这种学科组织行为的体现。布罗代尔说,“各门社会科学都在彼此强加于人,每一学科都试图借口自己具有‘完备性’来涵盖整个社会。每一学科都侵犯它的邻人,但又始终相信它还在自己的领域里”^{[3]28}。

学科组织文化是学科组织的内化性存在。“传统、习俗与实践,传播的知识、信仰、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以及他们进行交流的语言形式、符号形式和共享的意义”^{[74]56}都属于学科组织文化范畴。由于学科组织文化的形成是一种历史沿承,因此学科组织“倾向于依赖过去已有的信息渠道,并为过去的经验所制约”^{[69]332}。19世纪社会学的历史取向生长于欧洲思想界的旧有传统。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现实主义取向则源于“美国社会缺少历史传统”^{[75]196}。无论在历史学还是社会学内部,这种组织文化的建构都通过不同的偶像、话语加以夯实。在历史学系的走廊里可以看到兰克、克罗齐、布罗代尔等偶像挂像,而在社会学系则可能是孔德、韦伯和涂尔干;历史学的评价话语常为“史料详实”“梳理细致”,而社会学评价话语则可能是“理论突破”“模型建构”;历史学的专业术语以“语域”(或可称为“史学味”)这种微妙的方式存在,而社会学的术语则常让专业外的读者难究其奥^{[74]55}。显然,对欲创造社会学与历史学学科间融通的学者而言,对各自学科文化的偶像、话语进行冒险般的扬弃就成为一种需要。20世纪初新史学对兰克的批评、史学话语从叙事向分析的转换、20世纪60年代后社会学界对帕森斯的批判、社会学“过程—事件”话语的激活等均缘于此。

学科领袖与普通成员共同组成了学科组织。在学术界,学科领袖对于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作为把关者和评判者,他们来决定哪些工作是好的,哪些是不重要的……同时,还会对相邻的专业领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74]100}。法国历史学之所以能与社会科学保持数十年的联盟,布罗代尔这位强势学术领袖所起的作用不可小觑,“他的性情决定了他要去缔造一个帝国”^{[4]33}。从费弗尔1956年辞世到1985年,布罗代尔既是享有极高荣誉的法兰西学院教授,又执掌着著名的史学研究中心第六部^①,还担任着《年鉴》杂志主编。布氏轻而易举地“控制了研究基金、出版与职位,这给予他相当大的权力,而他

① 1971年,布罗代尔将第六部进一步发展成为能够颁发博士学位、设有研究导师和研究员职位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

利用这一权力,推进社会科学的‘共同市场’的理想”^{[67]38}。值得注意的是,学科成员结构也是影响学科关系发展的另一变量。以美国为例,19世纪的历史学家大都具有新英格兰地区贵族血统,故其研究兴趣多在传统政治精英;20世纪初,随着史学组织化的确立,中产阶级出身的职业史家群体开始崛起,其兴趣则向新史学有所倾斜^{[76]85-86};二战后,出身欧洲(特别是德国)、底层或少数族裔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带来了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系和更多样的研究视角。经历左翼运动熏陶,深受时代改革精神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历史学、社会学都在融通彼此的道路上遽进。

(二) 两门学科关系发展受学科研究目的、对象、方法等变化所影响

作为影响学科发展的内生性变量,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发展,一直缠绕在各自学科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变动的对张之中。

社会学从创立时起就极为看重“重要性高于个体”的“社会”,“试图阐述一种单一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77]6}。而历史学则高度关注事物的特殊性,“它从发生、变化和特殊之物的角度来处理它们”^{[41]10},“换言之,它的目的不在于确立普遍法则”^{[41]22}。例如,美国社会学家尼尔·斯梅尔瑟出版的关于工业革命时期社会变迁的著作就被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批评为“‘社会学’无法理解‘阶级’这个术语指进程,而非结构”^{[70]20}。研究目的的差别是两门学科交异的重要原因。以学科组织论,这种对学科研究目的差异化强调同样是“学科分工造成的”^{[78]210}。不过,若学科组织彼此模糊或互相浸入,学科在研究目的上就会出现交叉,从而给学科间融通创造机会。在学科关系史上,社会学一旦开始“强调过程并在瞬时(temporal)的场景下解释结果”^{[79]2},历史学也开始呼吁“必须建立结构的历史(histoire structurelle,或histoire structurale)”,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就出现了变化。从学理上论,彼此学科研究目的的扩大源于事件与类型是不可能全然切割的,“如果事件不被视为具有某种程度的规则性和不变性,不被视为属于某种类型,其中所有个案都具有许多共同特征,那么事件就会失去它们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意义”^{[80]187-188}。在学术实践上,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都是社会学与历史学学科研究目的交叉的经典之作。这也说明,当社会学将史实与过程作为研究起点,当历史学将理论作为对话方,“研究的结果将是对它们的修正,也许是非常大的修正,并用那些真正实现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交流的理论来替代它们”^{[80]191}。而这种替代,无论是对历史学还是社会学,“双方都将会从中获益”^{[80]191}。

研究对象可以分为空间性对象与时间性对象。在社会学与历史学学科关系史上,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也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动。毫无疑问,这种变动影响着二者之间的关系。空间性上,社会学致力于研究社会和人类行为,而历史学则经历了从研究精英政治到基层社会的转变。经过年鉴学派改造,历史学号称自己须研究全部事实总和的“总体史”。因空间性研究对象的转变,“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们踏上了远离政治的社会史之路”^{[54]10},历史学与社会学变成了“同一种学术冒险”^{[59]359}。时间性上,在社会学草创期,历史与现实都被纳入社会学家的对象范围。“任何研究社会的理论都必须有能力描述它自身的起源与发展”^{[60]209},换言之,“根据这个社会面对其主导条件的内部发展历史来阐明它的出发点”^{[60]209}视为社会科学的必修课。但20世纪以降,社会学自划牢笼,在研究对象中剔除历史。因无法对社会进行反思性考察,社会学不得不再经历“历史转向”,通过与历史学在时间性对象上共享,“将社会学的研究历史化,并将其研究积淀在时间与空间中”^{[30]30},方使其“更具知识力量”^{[30]30}。不难理解,20世纪后半叶,正是因为社会学将历史学时间性上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将社会学空间性上的研究对象互相摄入自己的研究中,社会学与历史学才勇敢地建立起彼此的融通。

“对知识的划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达到精确的程度,但它并不意味着在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或者甚至说是方法论上的区别。”^{[81]42}。一旦社会学与历史学都关怀理论与过程,且研究对象是“社会生活的全部内容”^{[25]57},两门学科就可能在方法论上彼此取长补短,推动各自学科的进步。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提出,“历史学家要使自己获得足够的社会学知识,以便使自己成为尽可能好的历史学家”^{[15]218}。年鉴学派向史学界大声呼吁:“去阅读和浸淫在那些由不同社会科学家所创造的知识,利用他们的假设和概念去组织你们的研究和阐释你们发现的材

料。”^{[82]221}“社会学对历史学的重要实际贡献之一就是为历史学提供了纠正准确性不足的工具和技术,使历史学家可以用准确的、结构严谨的假设去取代一厢情愿的推测。”^{[25]72}同样,将“运用历史作为构建一般社会理论的有力工具”^{[65]12},从而把“时序”带回社会学,在一时一地上,社会学开始使用趋势研究、同期群研究、跟踪研究等方法;在更大范域上,社会学可以对“大规模的、极其重要方面提供历史性的扎根解释”^{[83]281}。“没有历史知识是不可能发展社会学理论的”^{[84]1},且历史学方法不仅可以帮助社会学在时间序列上建立解释过去的理论,也同样有助于建立一般社会的理论^{[65]15}。

(三) 两门学科关系发展受外部环境变迁影响

“学科命运的变化是学术界与其大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又一个体现。”^{[74]200}学科发展嵌入于外部性重大环境的变迁中,是学科关系发展的外生性变量,这其中,意识形态作用不可小觑。

“史学研究的动力深藏于动荡起伏的现实之中,虽然它不是一种简单的立竿见影式的直观反映,但无形之中的潜移默化足以左右研究者的走向和价值判断。”^{[85]“自序”5}社会学亦然,“各个时期理论家们的理论,表面看来像是纯理论性的问题,但实际上都是当时现实社会中的社会问题的反映”^{[28]前言2}。19世纪社会学的史学倾向与西方社会剧烈的社会变迁不无关系,“为了对历史变迁加以阐释,社会学应运而生”^{[77]3}。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的具象化经验转变肇因于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和阶级构成却特别复杂……最迫切的议题就是完善既存秩序”^{[75]196}。二战后,西方社会出现的包括群众行为、文化移入、城市化、精英人物作用等新问题让传统史学方法捉襟见肘,“史学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重大差距”^{[25]57}逼迫着历史学家向社会学的方法求助。由前文梳理可知,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复兴对两门学科关系的融通起到了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扩大恰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9年西方经济大萧条、1968年西方左翼运动等象牙塔之外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发生具有相关^{[82]219}。

意识形态是外部环境作用于学科关系的重要抓手。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86]253}学科由知识分子组成,知识分子又自处于社会历史领域之中,因此,学科关系不可能不受意识形态变迁的影响。西方历史学关注政治、精英,疏离社会学,背后有其“逐步建立民族—国家和扩展‘文明’的欧洲模式”^{[87]85}的意识形态诉求。20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87]85}。社会学方面,正是“关于社会所应该成为的和人们希望它成为的模式在某些意识形态上的观念导致了19世纪的社会学家把主要兴趣放在对于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方面”^{[29]“序言”13},而“另外一些意识形态上的观念则导致了20世纪社会学领域里主流理论家们特别强调社会存在和社会的客观状态,导致了他们不重视社会形态的形成以及对长期的社会进程和对由这方面的研究所带来的新的解释不感兴趣”^{[29]“序言”13}。两种看似相歧的意识形态恰都反映了西方国家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阶层的信念、理想与希望。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认为,正是意识形态的变迁影响了社会学家对社会长程研究的兴趣。要了解意识形态如何影响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取向,埃氏指出,我们不仅要分析国内阶级形态变动,还要将“这些国家本身也作为一个整体,作为正在扩张的社会形态的崛起”^{[29]“序言”15}予以考虑。具体如,二战后,现代化理论“深深嵌入了社会科学话语”^{[29]“序言”15},但现代化理论本身就是作为美国扩张社会形态崛起的一种意识形态。“现代化意识形态提出,要用新的、开明的国际援助形式来取代欧洲老殖民主义,由此它也重新塑造美国自己以往的帝国主义历史”^{[88]338}。作为一种反现代性理论,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下的社会学研究难以具备历史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抗,20世纪60年代后,“历史社会学就是要以更为广博的学科视角来反思社会学关于现代性的理论”^{[78]226}。

(四) 两门学科关系发展被学科时序差所左右

每一门学科都会经历诞生期、上升期、下降期等学术生命波动周期。社会学与历史学在近代以来的交与融通与两门学科发展阶段的时序差具有正相关性。这是学科关系研究中较少被注意,但又十分重要的协变量。一般而言,学科诞生期多为学科“交异”期,学科上升期多为学科“交异”期或主动“融通”期,而学科下降期则为学科被动“融通”期。概而言之,在学科组织、学科理论、学科外部环境分析外

加入时间轴,我们能够将学科关系史研究从“二维”转入“三维”维度,从而看到更立体也更清晰的学科变迁画面^{[89]207}。当然,由于仅为协变量的原因,具体论之,在时间轴之外,我们尚需要与前述外生性与内生性变量进行综合考量。

在学科诞生期,作为自我合法化的确立期,学科的排他性较强。如19世纪后半叶,历史学孜孜以求“把本身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作为单独的学科,并要保卫自己免受不时出现于其领域的好像是敌对的科学的侵占”^{[90]57}。为此,历史学对社会学的排斥就会比较明显。在取得合法地位后,学科步入上升期,从夯实学科稳定性出发,也时而强调“交异”。“一个稳定的组织结构常常产生稳定的利益集团”^{[69]321},“避免创新、保持稳定是组织的内在机制”^{[69]333}。故而,二战前后,处于上升期的社会学就会彻底割断历史取向,转而细化、深化已有的与现实关联密切的中层理论与经验研究,这样“学科的系统性和稳定性会越来越坚固、越来越精细”^{[91]21}。但由此说学科上升期一定没有融通,也不确切。如在20世纪初,处于上升期的历史学希望与社会学融通,不过这多为学科内外各变量互动引起的主动融通,且会遭遇与学科内主流学派的斗争。而在学科下降期,为保持学科生存,学科往往会迫于压力开放学科边界,被迫走向融通。20世纪50年代,在遭遇史学危机后,历史学科开始挑选、映射、吸纳社会学的资源,实现与其他的学科融通,但底线是不能威胁历史学科组织生命延续。1965年后,由于受美国科学史家库恩“范式说”、社会运动、社会问题等多要素冲击,社会学也经历了一小段学科下降期。从时序上看,这恰为社会学的历史转向提供了融通机会。几乎同时,学科革新运动的开展,造成了新的知识生产与再生产。通过对其他变量的影响,社会学既巩固了自身学科的合法性,也形成了对邻近学科新的交异。

参考文献:

- [1]勒高夫.新史学[M].姚孟,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 [2]贝尔特.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M].陈生梅,摆玉萍,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3]布罗代尔.论历史[M].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4]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M].王春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5]科恩.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M].梁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 [6]孔德.论实证精神[M].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7]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狄玉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8]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9]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10]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1]易兰.西方史学通史:第5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 [12]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3]沃勒斯坦.反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M].刘琦岩,叶萌芽,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 [14]德拉科鲁瓦,多斯,加西亚.19~20世纪法国史学思潮[M].顾杭,吕一民,高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15]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M].田时纲,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 [16]张广智.克里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 [17]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兰克史学文选之一[M].杨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18]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 [19]华勒斯坦,儒玛,凯勒,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M].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 [20]王学典.述往知来:历史学的过去、现状和前瞻[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 [21]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M].王宪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 [22]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M].景德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23]杨豫.西方史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5]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杨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26]杨豫.西方史学史研究导引[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27]塞德曼. 有争议的知识——后现代时代的社会理论[M]. 刘北成,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 [28]贾春增. 外国社会学史[M]. 第3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 [29]埃利亚斯. 文明的进程: 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M]. 王佩莉,袁志英,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 [30]肯德里克·斯特劳·迈克龙. 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C]. 王幸慧,江正宽,詹缘端,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31]王康. 社会学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 [32]瑞泽尔. 古典社会学理论[M]. 王建民,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4.
- [33]陈恒. 都市社会学[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34]波普诺. 社会学[M]. 李强,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35]巴伯. 科学与社会秩序[M]. 顾昕,郝斌祥,赵雷进,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 [36]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7]周怡. 社会结构: 由“形构”到“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J]. 社会学研究, 2000(3).
- [38]波特·罗斯. 剑桥科学史: 第7卷[M]. 第7卷翻译委员会,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
- [39]德兰迪·伊辛. 历史社会学手册[M]. 李霞,李恭忠,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 [40]米尔斯. 白领: 美国的中产阶级[M]. 周晓虹,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41]埃尔顿. 历史学的实践[M]. 刘耀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42]沃勒斯坦. 知识的不确定性[M]. 王昶,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 [43]单天伦. 当代美国社会科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 [44]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 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M]. 何兆武,译.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 [45]多斯. 碎片化的历史学: 从《年鉴》到“新史学”[M]. 马胜利,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46]何兆武.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47]董进泉,王建华,张家哲,等. 历史学[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9.
- [48]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当代学术通观: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人文科学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49]弗拉德. 计量史学方法导论[M]. 王小宽,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 [50]裴长洪. 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 [51]阿普尔比·亨特·雅各布. 历史的真相[M]. 刘北成,薛绚,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52]永原庆二. 20世纪日本历史学[M]. 王新生,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53]伊格斯. 欧洲史学新方向[M]. 赵世玲,赵世瑜,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9.
- [54]约尔丹. 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M]. 孟钟捷,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55]贝尔纳. 社会科学: 结论[M]. 伍况甫,彭家礼,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 [56]阿隆. 社会学主要思潮[M]. 葛志强,胡秉诚,王沪宁,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57]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 李康,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58]陈燮君. 学科学导论——学科发展理论探索[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1991.
- [59]苏国勋,刘小枫. 二十世纪西方社会理论文选[C].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5.
- [60]李培林,覃方明. 社会学理论与经验: 第2辑[C].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61]郑杭生,杨敏,吴平清,等. 品味社会学[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4.
- [62]冈恩. 历史学与文化理论[M]. 韩炯,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63]周兵. 新文化史: 历史学的“文化转向”[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 [64]比尔纳其. 超越文化转向[M]. 方杰,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65]董建波. 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 [66]周兵,张广智,张广勇. 西方史学通史: 第6卷[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 [67]伯克. 法国史学革命: 年鉴学派 1929—1989[M]. 刘永华,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68]宣勇. 基于学科的大学管理模式选择[J]. 中国高教研究, 2002(4).
- [69]周雪光. 组织社会学十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70]伯克. 历史学与社会理论[M]. 姚朋,等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71]黄长著,黄育馥. 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政策与管理研究[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72]方文. 社会心理学的演化: 一种学科制度视角[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6).

- [73] 劳埃德. 形成中的学科——对精英、学问与创新的跨文化研究[M]. 陈恒, 洪庆明, 屈伯文,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74] 比彻·特罗勒尔. 学术部落及其领地: 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 唐跃勤,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75] 什托姆普卡. 社会变迁的社会学[M]. 林聚任, 蒲茂华, 陈洪捷,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76] 中国留美历史学会. 当代欧美史学评析: 中国留美历史学者论文集[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 [77] 拉赫曼. 历史社会学概论[M]. 赵莉妍,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78] 孙琇. 解读蒂利——查尔斯·蒂利的政治转型与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发展[J].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
- [79] 斯考切波. 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M]. 封积文,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80] 托什. 史学导论: 现代历史学的目标、方法和新方向[M]. 吴英,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81] 吉登斯. 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M]. 文军, 赵勇,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82] 华勒斯坦, 霍斯金, 亨特, 等. 科学·知识·权力[M]. 刘健芝, 编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83] 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M]. Cengage Learning Asia Pte Ltd, 2015.
- [84] 曼. 社会权力的来源: 第1卷[M]. 刘北成, 李少军, 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 [85] 李喜所. 中国留学史论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8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87] 梁启超. 新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88] 雷迅马.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M]. 牛可,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
- [89] 伯克. 知识社会史: 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M]. 汪一帆, 赵博因,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 [90] 鲁滨孙. 新史学[M]. 齐思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91] 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研究组. 跨学科研究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C].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Differentiation" and "Amalgamation":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logy and History since Modern Times

Wang Linran

(School of History , Institute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 Nankai University , Tianjin , 300250)

[Abstract] In the 19th century , sociology had a strong historical approach while history had little interest in sociology.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 history started to seek cooperation with sociology while the mainstream of sociology developed towards the concrete empirical study. After World War II , especially after the 1960s , sociology advocated "turn to history". Sociological research with a historical approach was accordingly revived. Over the same period ,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with a social scientific approach remained in the ascendant , despite of occasional setbacks. By summarizing the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logy and history , we fi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enslaved to the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of disciplines; they vary with the change of their respective research purposes , objects and methods , are affected by the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swayed by the temporal difference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he juxtaposition of quadruple logics has resulted i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amalgamation of western sociology and history for over two centuries.

[Key words] sociology; history; developmental history of disciplines;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iplines; temporal difference of disciplines

(责任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李晓丽)